月霞法師生平史事輯考[1]

——以近代報刊資料爲中心的考察

上海大學歷史系 博士生
賴學輝

摘　要

月霞是晚清民初復興華嚴宗的核心人物之一。然而，月霞法師的生平歷史充滿疑雲，長期以來未能得到解答。本文通過對近代報刊史料的重新發掘，考釋出學界以往未能正確認識的月霞生平史事。月霞於光緒五年（1879），即其二十二歲時，在南京觀音寺禪定法師處出家，後於光緒七年（1881）在九華山大通蓮花寺田如律師座下受具足戒。月霞在南京出家之後，與在南京創辦金陵刻經處的楊文會交往密切，故而有機會開始接觸華嚴義學。在清末出洋遊學的浪潮中，月霞曾於 1906 年至 1908 年間先後兩次出洋考察，分別游歷日本與東南亞諸國，瞭解當地佛教情況，並因此與旅日的趨新士人有密切交往。袁世凱復辟前後，月霞旅日的「故交」，同時也是「籌安會」成員的孫毓筠、劉師培等人邀請月霞至北京講經，月霞因與復辟思想觀念相左，故而稱病南歸。民國初年，月霞創辦於杭州海潮寺的華嚴大學，在 1916 年秋為浙軍所占，月霞雖然得到旅滬士人契友的奔走相助，但最終斡旋無果，華嚴大學不得已停辦。

關鍵詞：月霞、華嚴宗、華嚴大學、近代報刊、考證

---

[1] 本文在會議發表過程中，承蒙牟立邦與徐聖心兩位教授的指正，並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特此致謝。

月霞法師是晚清民初復興華嚴義學的關鍵人物。月霞在出家之後，遍參諸家，尤以復興華嚴義學著稱於世，他在清末民初興辦僧教育，培養出持松、常惺等眾多在佛教內具有影響力的僧侶，從而構建起近代華嚴宗的旗幟。因此，當代學者常常將其與天台宗的諦閑並提，分別推尊他們為復興華嚴、天台兩宗的祖師，而盛讚月霞「為民國以來僧教育之始祖，亦不為過。」[2]

學界對於月霞生平史事的認識過度依賴佛教內部史料路徑，以至於對其生平事跡尚不清晰。其中，月霞的出家、受戒之時間、地點，均存在多種說法。而關於月霞何時接觸華嚴義學，便存有多種不同的見解。近代中國開始與世界發生密切的聯繫，尤其是清末出洋留學或考察一時成為新潮，月霞便是近代最早出洋考察、瞭解世界的僧侶之一，但學界對相關事實未能梳理明晰。袁世凱復辟期間，籌安會成員曾邀月霞赴北京講《楞嚴經》，該事件被大量報道，在當時影響頗大，但學界鮮有關注。此外，月霞在杭州海潮寺創辦華嚴大學期間，曾因軍隊的占領而被迫停學，該事件的經過與影響也尚未有清晰的論述。鑒於上述討論有諸多未盡之處，本文以近代報刊為主要資料，利用新發現的月霞傳記史料對月霞生平相關的重要史事進行考察。

一、 月霞出家、受戒的時間與地點

月霞法師出家與受戒的時間和地點，是一個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月霞的出家和受戒地，于凌波曾指出月霞的出家地點有兩種不同的說法[3]，鄧子美則認為月霞的出家與受戒地都存在兩種不同記載[4]。實際上，月霞的出家、受戒的時間與地點的不同說法，主要源頭有三：一是持松〈月霞老法師傳略〉中「洎光緒八年，乃藉以他故辭二親，得離俗家，時年廿四……既離家，遂直往金陵，依觀音寺禪定大師求披薙，即年至大通蓮花寺，因如律師為之授滿分具足戒」[5]的記載；二是應慈〈月霞顯珠禪師行略〉中的「十九歲……是年三月……隻身行至南京大鐘寺老和尚座下頂禮求度……二十歲，受具足戒於九華山」[6]；三是釋東初在其《中國佛教近代史》中提出的新說法：「十七歲於南京大鐘寺依參老，次年，即於九華山

---

[2] 釋東初，《近代中國佛教史》（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 年），頁 204。
[3] 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頁 23。
[4] 鄧子美，〈近現代華嚴傳燈錄：月霞學案（初稿）〉，《華嚴學研究・第三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 年），頁 46。
[5] 持松，〈月霞老法師傳略〉，《覺有情》第 62、63 期合刊（1942 年 5 月），第 1 版。本文中有關年齡的討論，根據當時的情況，均依中國傳統的「虛歲」計齡方式。
[6] 應慈，〈月霞顯珠禪師行略〉，《武進天寧寺志》卷七，收入《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第 35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 年），頁 255。

受具足戒」[7]。由此可見，月霞的出家時間即有三種說法：1882 年（光緒八年）、1876 年（十九歲）、1874 年（十七歲），而月霞的出家地則有觀音寺與大鐘寺兩種說法。根據前述，月霞的受戒時間同樣也有三種說法，即 1882 年（光緒八年）、1877 年（二十歲）、1875 年（十八歲）；而月霞的受戒地的二種說法：九華山與大通蓮花寺，實際上所指實為同一地點，大通蓮花寺即在九華山。

上述所引的文獻，最早的是持松發表於 1942 年 5 月的〈月霞老法師傳略〉一文，該文發表時距離月霞圓寂已經 24 年。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月霞出家、受戒的時間、地點的早期記載，並非只有上述幾份傳記資料，在筆者新發現的兩篇月霞傳記中即有明確記載。其一為李曉暾《月霞法師事畧》：「年二十二，辭別二親，薄遊江淮，憩金陵觀音寺禪定長老，一見奇之，為之髡染。二十四受具……」[8]。其二是汪允宗所撰〈月霞法師行記〉中所載：「辭家，江寗就禪定法師薙染。復就大通田如律師受戒，時年二十四，勝清光緒八年也。」[9]又同文還提到月霞圓寂時「世壽六十歲，僧臘三十有九。」[10]

在這兩篇月霞傳記中，〈月霞法師事畧〉撰寫於民國四年（1915），是該文作者李世由與月霞法師「共食住月餘」的情況之中撰寫的；而〈月霞法師行記〉則撰寫於月霞圓寂後不久，其作者汪允宗是晚清民初的知名報人，與月霞交往長達二十年，他主持的《神州日報》曾多次發表有關月霞的消息。1918 年 9 月，汪允宗在返滬的輪船上離世，次月他的這篇遺作〈月霞法師行記〉發表在《神州日報》上。〈月霞法師行記〉與持松所撰〈月霞老法師傳略〉有許多內容相近，但持松所撰文的發表時間要晚 24 年，持松在撰〈月霞老法師傳略〉時參考的文獻極有可能包含了汪文。

月霞法師的出家時間與地點，依據〈月霞法師事畧〉，月霞法師是在二十二歲即光緒五年（1879）在南京觀音寺禪定法師處出家，這與汪允宗所述的地點一致，又根據汪氏所記月霞「世壽六十歲，僧臘三十有九」推算，出家時間也是二十二歲。此外，月霞在世時也曾有報刊報道，謂「（月霞）於二十二歲披剃於金陵某寺」[11]；

---

[7] 釋東初，《中國近代佛教史・下》，頁 755。

[8] 李曉暾，〈月霞法師事畧〉，《神州日報》1915 年 8 月 31 日，第 8 版；又李曉暾，《諦閑月霞兩法師事略》，北京：北京正蒙印書局代印，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普線長 722740。所引〈諦閑月霞兩法師事略〉無作者署名，作者名乃根據〈月霞法師事畧〉添加。又李曉暾在其「日記」中的自述，其曾在民國四年（1915）撰寫有關諦閑、月霞的〈兩法師事略〉，參見金陵刻經處編：《金陵刻經處大事記長編：1964—1952》（武漢：崇文書局，2022 年），頁 117。李世由（?－1921 年），安徽省廣德直隸州人，一名振鐸，字曉暾。李臣典之孫，官江蘇清河、吳江縣等縣令。

[9] 汪允宗，〈月霞法師行記〉，《神州日報》1918 年 10 月 27 日，第 6 版。

[10] 汪允宗，〈月霞法師行記（續）〉，《神州日報》1918 年 10 月 30 日，第 6 版。

[11] 佚名，〈誌諦閑顯珠兩名僧之蹤跡〉，《時事新報》1915 年 7 月 29 日，第 2 張第 3 版；又佚名，〈諦閑顯珠兩法師訪問錄〉，《時報》1915 年 7 月 29 日，第 2 張第 4 版。

而汪允宗的說法，與同年月霞自述的說法也是一致，其云：「月霞廁身佛門三十九年」[12]，圓寂前說偈亦提及年齡「混沌六十年」[13]。由此可知，月霞出家的時間與地點，應該為光緒五年（1879）在南京觀音寺禪定法師處，而非前述應慈、東初等人的說法。

關於月霞的受戒時間，李世由在〈月霞法師事畧〉中只謂其「二十四受具」，這與持松和汪允宗二人的記載是一致。但是，月霞生於咸豐八年（戊午），圓寂於丁巳年，世壽為六十歲，其二十四歲時應該是光緒七年（1881），而非汪允宗所謂的光緒八年（1882），持松因參考汪氏之文也延續了其錯誤。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確月霞出家、受戒的時間與地點，即月霞於光緒五年（1879）在南京觀音寺禪定法師處出家，後於光緒七年（1881）在九華山大通蓮花寺因如律師座下受具足戒。

二、 月霞接觸華嚴義學的時間

月霞被尊為華嚴宗的「中興祖師」，但他從何時開始接觸華嚴義學卻始終未有明確的記錄。據陳英善教授的總結，月霞與華嚴的因緣存在有三種不同的說法：

> 第一種說法，於 1882 年終南山時期；第二種說法，是受了塵禪師之啓發；第三種說法，約於 1890 或 1891 年親近法忍禪師時，開始接觸華嚴。[14]

且陳英善認為，月霞於何時開始接觸華嚴，因受制於文獻資料而難以定論。

月霞以華嚴為宗，並以畢生精力傳播華嚴義學、培育弘揚華嚴僧材，應該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而他何時開始接觸華嚴，則應該回到月霞相關生平資料中去尋找線索。上述陳氏的總結，是總結近當代學者的論著的觀點而成，如果考察月霞的相關傳記，則還有不同的說法。

在幾篇習見的月霞傳記中，最早發表的是月霞的學生智光發表於民國十九年（1930）3 月 1 日的〈月霞法師略傳〉，該傳內容並未明確提及月霞最初接觸華嚴義學的具體時間。[15]數年之後，月霞的法弟應慈撰寫了另外一篇月霞傳記〈月霞顯

---

[12] 佚名，〈月霞禪師武昌講經記〉，《申報》（1917 年 5 月 8 日），第 7 版；又佚名，〈月霞禪師講經記〉，《時事新報》1917 年 5 月 9 日，第 3 張第 4 版。
[13] 警世人，〈月霞禪師圓寂後之所聞〉，《時報》1918 年 2 月 3 日，第 3 張第 7 版。
[14] 陳英善，〈月霞大師之華嚴・禪——兼論應慈、持松法師等〉，《華嚴學研究・第三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 年），頁 102。
[15]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第 11 卷第 3 期（1930 年 3 月），法苑藝林，頁 3-5。

珠禪師行略〉，該傳同樣沒有述及月霞接觸華嚴義學的經過。在應慈的描述中，月霞在其三十九歲於安徽翠峰寺任講《八十華嚴》之前，均未提及月霞與華嚴義學之間的關係。[16]

與前述的兩篇傳記不同，在月霞的弟子持松所編寫的〈月霞老法師傳略〉中，雖然沒有說明月霞接觸華嚴義學的最初時間，但明確描述了月霞以華嚴義學為宗相關的事件：

> 受具已，於是攜瓶鉢，著衲衣，普謁名山。特至長安，探賢首國師弘道之地，凡隋唐間大闡佛教者，皆在北地，師莫不尋禮。及至五台，禮文殊，之一山麓，遇攜馬少年，問曰：華嚴行者，九華廟在何所？師一回顧，遂不見。曰：此必文殊示吾弘華嚴之處也。[17]

在持松的敘述中，月霞在其受具足戒之後，便特意前往西安尋訪華嚴宗祖師賢首法藏的弘法之地。此後，月霞在後續參訪五台山的過程中，因遇到「攜馬少年」，並將其視其為文殊示現的感應事件，從而明確了他此生弘揚華嚴的志向。因此，倘若持松的記述無誤，那麼月霞接觸華嚴的時間應該在他受具之前。

但是，持松的敘述與月霞生前的相關記載多有抵牾之處。持松認為，月霞在其二十四歲受具足戒之後，便北游西安與五台山。但據月霞生前的報刊資料所載，月霞北游五台山是在光緒二十年（1894），此時月霞已經在法忍座下擔任輔講開始弘法歷程了。[18]此外，汪允宗所撰的〈月霞法師行記〉，同樣認為月霞北游五台山是在他跟隨法忍於湖北歸元寺講經之後。[19]

僧侶接受一個宗派作為自己修行與弘法的核心，其中可能涉及很多因素，如出家寺院的宗派，或者一個地區的宗派思潮等等。如與月霞齊名的諦閑，便是在天台宗興盛的天台山高明寺出家，最後成為該宗的代表人物。月霞辭別家鄉之後，便到了江寧（南京）就禪定法師出家，此後在南京駐留數年時間。當時的南京正是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的中心之地，楊文會於 1866 年在南京創辦金陵刻經處，刊刻和流通佛教典籍。不僅如此，楊文會以華嚴義學為其所宗，以他為核心在清末開啓了一股傳揚華嚴義學的風潮。月霞在南京出家之後，直到光緒十三年（1887）

---

[16] 應慈，〈月霞顯珠禪師行略〉，頁 255-257。
[17] 持松，〈月霞老法師傳略〉，第 1 版。
[18] 李曉暾，〈月霞法師事畧〉，第 8 版。
[19] 汪允宗，〈月霞法師行記〉，《神州日報》1918 年 10 月 27 日，第 6 版；汪允宗，〈月霞法師行記（續）〉，《神州日報》1918 年 10 月 28 日，第 6 版。

到天寧寺坐禪期間，南京應該是其求法生活的主要範圍。根據汪允宗的描述，月霞在出家之後，與楊文會及其門下弟子的交往十分密切：

> 由是編參巨德，廣謁名山。誦經求解，惟日一不足。石埭楊仁山居士僑屬江寧，鍥鑯經論，流通全國，以大教中興為已任，四方佛子多萃其門。師皆與之往還討論。[20]

此外，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月金陵刻經處所刊刻的《因明入正理論疏》，在其刻資中有月霞所施洋銀三圓。[21]可見，月霞與楊文會應當早有過從。

綜合言之，月霞最初接觸華嚴義學的時間，極大的可能是在他出家後駐留南京期間，乃是受到楊文會弘揚華嚴義學的風潮的影響。

三、 月霞出洋游歷的相關史事

近代西潮驟至，中西交通大開，佛教徒也開始走出國門，瞭解世界大潮。最早出訪國外而具有影響力的佛教徒，應該是被後人成為「昌明佛法第一導師」的楊文會。1878 年，楊文會跟隨曾紀澤一道，以清政府的外交官的身份出使歐洲，這段經歷使他「成為最早以世界眼光來觀察和發展中國佛教的中國佛教徒。」[22]清朝的最後十年，清政府在無奈之中實行新政，於是有著名的「江楚會奏三疏」，其中有獎勵遊學，尤其提倡赴日本留學，由此開啓了一波赴日留學考察的熱潮。趁著這股熱潮最早出洋考察的僧人，是北京觀音寺的覺先，他在 1904 年春天，在日僧渡邊信哲等幫助下，赴日本考察游歷，並在歸國之後開始推動在京師成立佛教學務總公所，開啓一系列的佛教改革活動。[23]在覺先考察日本兩年之後，月霞也踏上了赴日考察的行程。

學界對月霞出洋考察的經歷大都語焉不詳，甚至考證無據而致史事的錯謬。[24]其主要原因是習見的月霞傳記中對此書寫十分模糊，研究者又未能擺脫傳統的史料依賴，從而使得月霞出洋考察的事跡一直沒能有清晰的認識。通常認為，月霞出洋考察首先途經日本，而後經由南洋、印度諸國，講學、考察長達三年。[25]這一

---

[20] 汪允宗，〈月霞法師行記〉，《神州日報》1918 年 10 月 27 日，第 6 版。
[21] 金陵刻經處編，《金陵刻經處大事記長編：1864—1952》，頁 41。
[22] 陳繼東，〈探尋釋迦原典——近代佛學的形成與中日互動近代佛學的形成與中日互動〉，《漢語佛學評論》（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422。
[23] 左松濤，〈近代中國佛教興學之緣起〉，《法音》2008 年第 2 期，總第 282 期，頁 35。
[24] 如賀金林就錯誤地斷定：「1903 年，他（月霞）出訪印度、南洋和西歐諸國，遍察各國佛教，三年始歸。」見賀金林，〈清末僧教育會與寺院興學的興起〉，《安徽史學》2005 年第 6 期，頁 32。
[25] 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史・第十五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231。但是該

觀念或許直接來自於應慈所撰的〈月霞顯珠禪師行略〉的記載，謂：「（月霞）四十六歲出洋考察各國佛教，由日本而南洋，而印度，而歐西，游方說法者三年。」[26] 但是，這一記錄正好與持松的記述相矛盾，據持松記載：

> 比年（丙午年，即 1906 年）桂君伯華邀留東人士請師至日本，設佛學研究社。己酉（1909）歸，安慶提學使沈君子培約主迎江寺。次年，沈君勸師游歷歐美諸邦，考察宗教，參觀勝跡，搜集遺經，及達暹、緬，因水土不服，胃疾驟起，遂返。[27]

若據持松所述，月霞是在 1906 年受桂柏華的邀請到日本講學，到 1909 年歸國，而翌年（1910）又在沈曾植的勸說下，企圖游歷歐美，到達泰國、緬甸之後，因水土不服而返國。以上關於月霞出洋游歷的兩種說法，無論是時間還是經過都相互抵牾。隨著新史料的發現，對該史事可以做進一步的澄清。

首先，可以明確的是，上述史料關於月霞首次出訪的時間與地點是一致的，即月霞於 1906 年受桂柏華的邀請，赴日本講經。其次，分歧之處在於月霞是赴日本之後，直接由日本前往南洋乃至印度各國游歷，還是自日本歸國後又再次出訪，以及月霞歸國的時間大致為何？

相較於持松撰述的內容，汪允宗所撰〈月霞法師行記〉更為完整的說明了出洋考察的情況與時間：

> （1906 年）值桂伯華居士，習密宗於日本，以留東同契，約師蒞講。師方游閩、浙，蒞鼓山戒會，得訊即橫海赴之。至則開「佛學研究社」，講《楞伽》諸經，日本僧眾為之震動……未幾歸國，值沈子培先生為安徽提學使，延師主迎江寺。冬禪夏講，儼然又一道場也。明年，沈更助師往游世界佛教諸國，冀以搜輯佚經，幽討靈跡。師乃躬涉重瀛，久而後歸，是行殆可比跡於顯、奘矣！[28]

書一方面認為月霞在「遜清之際」出洋考察，一方面有明確其在 1906 年前往東京，前後似有相互抵牾之疑。

[26] 應慈，〈月霞顯珠禪師行略〉，頁 256。

[27] 持松，〈月霞老法師傳略〉，第 1 版。沈子培即沈曾植，他當時所擔任的應為「安徽提學使」，而非「安慶提學使」。

[28] 汪允宗，〈月霞法師行記（續）〉，《神州日報》1918 年 10 月 28 日，第 6 版。

若依汪允宗的說法，月霞是在 1906 年受邀赴日本講經，講完即回國，並在次年在沈曾植的支持下，再度出洋游歷。此外，在 1907 年 7 月 1 日的《申報》上刊登有月霞即將游歷英、法、印度各國，請相關政府部門加給護照的消息：

> 安徽迎江寺僧人竺庵、顯珠等，游歷英法印度各國，已蒙安徽提學使沈給發護照，各一紙。該僧人以出洋游歷，須由上海道衙門給照，送請領事簽印後，方可前往。昨已稟准盛宮保，轉請瑞觀察加給護照矣。[29]

從上述所引兩則史料可知，在 1907 年 7 月前後，月霞應當已經從日本歸國，並在沈曾植的贊助之下，準備前往英、法、印度各國游歷。

又據當時同在日本，且列席月霞《楞伽經》講堂聽講的范熙壬（1878—1938）在 1907 年所發表的〈柬月霞法師〉中記載：「丙午冬，桂君伯華至日本，組織佛學研究會，特聘法師教授《觀楞伽經義記》，余廁其列，聽講數月，心中豁然，頓有所悟。」[30]同樣表明月霞在日本講說《楞伽經》的時間長度，應該在數月。

綜合言之，我們大致可以確證月霞出洋考察確係前後兩次，第一次出洋是在桂伯華的邀請下到日本講經，出發時間是在 1906 年間，在日本停留時間應該有數月之久。月霞的第二次出訪，則是於 1907 年 7 月之後，在時任安徽省提學使沈曾植的襄助下，游歷的目的地是南亞、歐洲等地，但因水土不服等因素，月霞未及踏訪歐洲便折返回國，歸國時間應該在 1908 年年底之前。[31]

月霞首次出洋的目的地在日本，他在日本的主要活動是為旅日人士講說《楞伽經》，當時相與講會的聽講者有章太炎、蘇曼殊、孫少侯、劉申叔夫婦、蒯若木夫婦，以及前述范熙壬等人，都是當時接觸佛教的革命人士。[32]聽講者對月霞的講經反應不一，如邀請者桂伯華對月霞的講說並不滿意，甚至於感慨：「自來辜負講經人，今日則辜負聽經人矣。若再開講，須自登座。」[33]當然同樣也有聽月霞講經數月，而「心中豁然，頓有所悟」的范熙壬。此外，月霞在日本「徧訪彼邦寺院」，考察日本佛教情況，瞭解日本佛教戒律與法系情形。[34]月霞第二次出訪到東南亞各國，游歷的目的相近，主要是為「參觀聖跡，搜集遺經」。[35]

---

[29] 佚名，〈游歷僧人稟請加給護照〉，《申報》1907 年 7 月 1 日，第 18 版。
[30] 范熙壬，〈柬月霞法師〉，《新譯界》第五號（1907 年 4 月 14 日），頁 12。
[31] 據《申報》報導，月霞在 1908 年 11 月 12 日之前，曾為安徽僧學堂聘請教員，以此推測當時月霞已經回國。參見佚名，〈僧學堂延聘教員（武昌）〉，《申報》1908 年 11 月 12 日。
[32] 參見歐陽漸著，《歐陽竟無著述集》（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 年），頁 553。
[33] 同上。
[34] 佚名，〈志諦閑顯珠兩名僧之踪跡〉，《時事新報》1915 年 7 月 29 日，第 2 張第 3 版。
[35] 李曉暾，〈月霞法師事畧〉，第 8 版。

兩次出洋考察的經歷對月霞有何種影響，目前學界很少明確論及。從月霞出洋前後的行動比較來看，我們可以見到其中的轉變之處。一方面，月霞在出洋之後的十年間，他與晚清民初的思想界，如康有為、章太炎、汪允宗等維新乃至革命人士交往密切，正是清末民初僧侶與士人之間的思想交流與相互影響。另一方面，月霞開始從單一的傳統講經方式，逐漸轉向一種新式的弘法模式，包括創辦新式的僧教育學校，以及公開向社會發表演說等。

四、 月霞受邀赴北京講經始末

民國四年（1915）7 月，時任北京政府參政孫毓筠、劉師培等人邀請月霞與諦閑到北京講經，受到報紙大量的報導。該事由於講經會組織者參與「籌安會」，而在當時產生頗大的爭議，同為主講的月霞和諦閑也在當時做出了不同的反應。

此次講經會，在孫、劉等人發出邀請時，有關講經的時間、地點，乃至所講的經典都未確定，可見此次活動的發起是頗為倉促的事件。[36]其發起的原因，據太虛在其〈自傳〉稱述，此次講經會的發起，是當時的北京政府對日本「二十一條」中「允許日本人在中國有布教之權」[37]一條所做出的回應，以表示中國自己亦有佛教：

> 這一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內有日僧來中國布教條款……因此、孫毓筠、楊度、嚴復等，請諦閑、月霞、道階就北京講經，表示中國亦信崇佛教，無待日僧的傳入，但籌安會帝制議興，孫毓筠等名列六君子，故道階雖在北京而未允其請；月霞到京講數日稱病南歸；獨諦閑興高采烈的留講於宣武門外江西會館，且傳袁克定亦來皈依聽講。[38]

在蔣維喬為諦閑所寫的碑銘中，也說明當時孫毓筠是「承政府之命，於北平設講經會」[39]，可見這次講經的活動，確係出自袁世凱政府的意志。

那麼孫毓筠等人為什麼會邀請諦閑和月霞，而非其他佛門人物？有研究者認為，當時月霞是為了籌措華嚴大學的經費而應邀去講經，但此說並無根據。[40]月霞、

---

[36] 參見佚名，〈孫少侯召請法師講經〉，《申報》1915 年 7 月 22 日，第 6 版。
[37]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中所謂的「布教之權」尤指「日本有在中國傳播佛教之權」。參見：佚名，〈特約路透電〉，《申報》1915 年 4 月 12 日，第 2 版。
[38] 太虛，《太虛大師自傳》，《太虛大師全書・第三十一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195-196。
[39] 蔣維喬，〈天台教觀第四十三祖諦公碑〉，見方祖猷著，《諦閑法師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年），目錄前一頁。
[40] 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史・第十五卷》，頁 233。

諦閑二人之所以受邀北上講經，一方面應該與他們當時的官方身份有關。民國元年（1912），在寄禪等人組織下的中華佛教總會成立，諦閑被公推為「演教科長」，月霞則為三名科員之一，可見他們在中華佛教總會中的職位即是講經法師的角色，而孫毓筠則與章太炎等三人，被請為中華佛教總會的「名譽會長」。易言之，月霞、諦閑二人與孫氏是中華佛教總會的同仁。另一方面，則因月霞與孫毓筠、劉師培等講經會籌劃者本為舊交。孫氏於 1906 年東渡日本，加入同盟會，並擔任總部庶務部幹事。劉師培也於 1907 年春，應章太炎等邀請東渡日本，參加同盟會東京本部的工作。在月霞赴日講《楞伽經》時，孫毓筠與桂伯華同為組織者，劉師培也曾參與講會。[41]

月霞與諦閑受邀之後，於 1905 年 7 月 14 日從上海出發，抵京後駐錫於東城本司胡同。二人抵京之後，孫毓筠開始籌備講經會具體事宜，他先是與內務總長朱啓鈐相商，並得到朱的贊許。其後，孫毓筠召集在京名流六十餘人於中央公園來今雨軒，商討講經的方式，明確了月霞、諦閑二人以五十日為期限講授《楞嚴經》，並公推孫毓筠籌辦歡迎會，以及劉師培負責起草歡迎會公啓。[42] 8 月 1 日，在京僧侶與居士在江西會館舉辦歡迎諦閑、月霞二人到京講經的大會，諦閑、月霞兩人先後發表了演說。[43]

8 月 8 日為開始講經的第一天，與會聽講者將近兩千人。此次講經會有非常明確的流程，每天晚上開講三小時，從晚上八點到十一點，中間休息二十分鐘，上下半場由諦閑與月霞接續分講，此外現場還發送宣傳單，裡面印有明確的講堂規則、講經通告與開講儀式。[44]

但是，講經活動開始不久，講經會的兩位核心組織者孫毓筠、劉師培二人，便廁身籌安會六君子之列，於 8 月 14 日聯名發起「籌安會」，公開鼓吹帝制。9 月 1 日，參政院開會，各省官員函電交馳，或派人入京，請願實行帝制。而在兩天之後，9 月 3 日月霞便因病返回湖北了。[45]但是，月霞在京的講經活動，應該在他稱病南返之前便已停止了。據諦閑在書信中稱，月霞在京只講了四座，與前引太虛「到京講數日稱病南歸」的說法一致。[46]

與諦閑此次赴京講經是他第一次面向士大夫宣講的情況不同，月霞早在 1906 年受邀赴日本講經，就開始向知識界公開演說佛教經典，並且聽講者都是思想前

---

[41] 李曉暾，〈月霞法師事畧〉，第 8 版。
[42] 佚名，〈孫少侯討論提倡佛教方法〉，《申報》1915 年 7 月 26 日，第 6 版。
[43] 佚名，〈兩法師之歡迎會〉，《申報》1915 年 8 月 5 日，第 6 版。
[44] 佚名，〈諦閑月霞兩大師第一日說經之盛況〉，《時報》1915 年 8 月 13 日，第 3 張第 5 版。
[45] 佚名，〈專電〉，《時報》1915 年 9 月 4 日，第 2 版。
[46] 諦閑，〈覆諸暨楊紫林居士書〔一〕〉，《諦閑大師文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 年），頁 188。

衛的革命人士。民國建立後，月霞移居滬上數載，與宗仰、汪允宗等人深交，對於時代潮流風向應該較諦閑更為瞭解，對袁氏復辟舉動必十分警覺。在講經會結束後未久，《益世報》上就曾發表抨擊該講經會的時評，措辭十分激烈，對兩位講經者頗有諷刺言論：

> 講場散了，兩大師亦見幾（機）而作，不敢冀頑石點頭，各卷其廣長妙舌，相率南下矣……揆厥原因，皆由發起延僧之孫楊輩，方為籌安會忙得烟塵抖亂，正在研究媚世法，不暇去參加出世法。兩大師護法無人，此會乃不免虛無寂滅。吾於是歡佛力之衰終，不敵帝力之大。[47]

因此，月霞在講經期間是否確實因病而輟講，抑或是佯病退出，現已不得而知。但從其親近者的記錄來看，月霞確實有不願再與孫、劉輩合作的動機。汪允宗就曾因此問題與月霞進行了問答：

> 會袁氏謀稱帝，延師赴講。師與諦閑法師偕往，時議謂：一旦踐阼者，將封為國師。師知之，不待講畢，托病先歸。遇諸海上，予問「何為徑歸？」師笑曰：「和尚乘汽車講經，不可自我作俑。」予曰：「乘汽車者不役舍生之力，非用人力馬力，乘輿負有苦樂之觀，師曷為舍之」師笑曰：「居士之言達矣，老僧實不願以佛法供人侮弄，故決然不留也。」[48]

可見，在月霞看來，袁世凱政府組織那場講經會的動機並非為弘揚佛教，而是想借講經之名為其復辟之舉背書。智光在〈月霞法師略傳〉中也認為，月霞因袁世凱陰謀帝制，而「即托病南旋，免受殃及。」[49]應慈也認為月霞是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甚至差點因此遇禍，其文謂：「嘗應孫毓筠之請，講《楞嚴經》於北平，以反對洪憲帝制，幾遇禍，遂南歸。」[50]總之，我們雖然無法就此斷定月霞曾公開反對帝制，甚至因此與孫毓筠等人發生抵牾，但他因此罷講而稱病南返，當無異議。

五、 海潮寺華嚴大學駐軍事件

民國五年（1916）秋的華嚴大學駐軍事件，是華嚴大學辦學史上的重要事件，該事件或直接導致華嚴大學的停辦。既往的相關研究中，對駐軍事件常常一筆帶

---

[47] 覺斯，〈時評一〉，《益世報》1915 年 10 月 12 日，第 2 版。
[48] 汪允宗，〈月霞法師記行（續）〉，《神州日報》1918 年 10 月 29 日，第 6 版。
[49]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頁 4。
[50] 應慈，〈月霞顯珠禪師行略〉，頁 257。

過，缺乏詳細的梳理。通過對相關史料的整理，我們能夠還原月霞在駐軍事件發生後做出的種種反應，既能夠補充月霞生平事跡的完整性，也能藉此瞭解月霞所處的境遇，以及民國初年佛教僧教育發展的困境。

1916 年 10 月間，浙軍第八團強駐華嚴大學校舍，導致華嚴大學課程被迫停頓勢將解散。[51]此事發生之後，月霞四處交涉。首先，他向教育部、內務部兩部分別發送了電報，懇請維持學校。教育部接到月霞的請求之後，向浙江省省長發出諮文，要求其查明核辦。內務部長孫洪伊也在 11 月中旬向浙江省督軍與省長發出諮文，要求核查辦理。[52]浙江督軍署在接到內務部諮文之後，於 11 月 4 日諮覆了內務部。其諮覆的主要內容為：

> 查華嚴學校在海潮寺內，該寺餘屋頗多，暫以一部分借駐軍隊，與校舍並無妨礙，且是項兵房已租籌備建築，工竣即行遷讓。現駐該寺原為一時權宜之計，前據該校長呈同前情，到署當經嚴令該管官長認真約束士兵，對於該寺房屋務須加意保護，毋稍損毀，以期兵士、僧侶兩得相安。[53]

從浙江督軍署的諮覆內容來看，一方面是確認了浙軍第八團確實駐軍於海潮寺內，但另一方面又否認強駐華嚴大學校舍，而稱海潮寺剩餘房屋頗多，暫借一部分以駐紮軍隊，並在兵房竣工後立即遷出。此外，浙江督軍署還承諾嚴令官長約束士兵，保護房屋，令兵士、僧侶兩得相安。

月霞除了爭取政府保護之外，也向他在文化界的朋友發出求助。11 月 18 日，在月霞的故交、一向護持佛教的狄楚青所創辦的《時報》上發表了〈華嚴大學避軍記〉一文，以為華嚴大學聲援。該文提到，當時旅滬的伍廷芳、應季中等人以該校中途輟學為可惜，且軍隊蹂躪寺觀並非保護宗教之道，因此曾聯名電請浙江省督軍主持公道，將軍隊遷出，以便該校繼續開課。伍廷芳等人的電報請求，得到的答覆與前述浙江督軍署答覆內務部的內容一致。但是，浙軍一直駐紮寺中，毫無遷出之信，大有久占不歸之意。[54]同日，《時報》上還發表了一篇署名為「蛆」的時評，聲援華嚴大學所遭遇的宗教不平等待遇，批評官廳畏強欺懦，言辭頗為激烈。[55]

---

[51] 佚名，〈諮浙江省長浙江華嚴大學校長電呈該校被浙軍強駐轉諮核辦文（第二千六百二十六號，五年十月三十日）〉，《教育公報》第 3 卷第 12 期，1916 年，頁 70。
[52] 孫洪伊，〈內務部諮浙江督軍、省長據浙江華嚴大學校長電陳浙江第八團強駐校舍等情諮請查核辦理並希見覆文〉，《政府公報》第 310 期，1916 年 11 月 14 日，頁 10-11。
[53] 佚名，〈浙江督軍署諮覆內務部查華嚴學校借駐軍隊係一時權宜之計已嚴令該管官長對於該寺房屋加意保護文〉，《時事新報》1916 年 11 月 20 日，第 1 版。
[54] 佚名，〈華嚴大學避兵記〉，《時報》1916 年 11 月 18 日，第 2 張第 4 版。
[55] 蛆，〈宗教平等乎〉，《時報》1916 年 11 月 18 日，第 2 張第 4 版。

當時身居上海的汪允宗，也接到了月霞派人送去的求助信，並立即上門求助於滬上友人，謀劃行動。汪允宗在與滬上同契商討之後，給月霞以「就因緣時節觀之，事尤可為也」的答覆。汪允宗在月霞傳記中還記錄到，該事件「翼日而事得解」[56]。但不知汪允宗與同契運作的結果，是否便是〈華嚴大學避兵記〉中所記述的情形。

月霞因海潮寺為軍隊所駐，又無法將其遷出，因此擬將華嚴大學暫時遷往安徽青陽縣九華山東崖寺續辦。[57]於是，月霞與東崖寺住持心堅接洽商妥之後，向安徽省長發電，呈請將華嚴大學前往東崖寺，並請求安徽省長飭知青陽縣出示公告，予以保護。[58]月霞同時派學生智光先行帶領部分學生到東崖寺進行籌備，但遷校一事由於月霞胃病復發，因此作罷。

但是，華嚴大學是否就此而結束，仍有疑處。[59]在持松與應慈所撰的月霞傳記中，均未明確華嚴大學停辦的具體時間。而智光在〈月霞法師傳略〉中則非常明確的記載華嚴大學結束的時間為「民五（1916）初秋」，也就是華嚴大學被軍隊占據的時間。[60]而汪允宗在〈月霞法師行記〉中則提到，華嚴大學在駐軍事件之後「越一年，全校卒業」，亦即華嚴大學約在 1917 年方告結束。[61]這一說法與記錄應慈生平的〈正法眼藏敘〉的記載一致，其文云：「民丁巳（1917）春，師（應慈）從月霞尊者習教卒」[62]。

綜合前述，我們或可推知，華嚴大學在駐兵事件之後便已經停課，部分學生逐漸離開華嚴大學，但月霞並未就此放棄，而仍四處奔走尋求解決駐軍問題，以求恢復學校。但月霞爭取讓駐軍遷出華嚴大學的努力未能成功，華嚴大學最終於民國六年（1917）初正式宣告結束。

六、 餘論

月霞在民國之後，被尊為華嚴宗中興的祖師與僧教育的開拓者，學者常常將月霞復興華嚴宗的前提條件歸功於楊文會對華嚴典籍的收集與刊刻。楊文會對月霞的互動卻不止於此。楊文會在南京創辦金陵刻經處，流通經典之外，他的佛學

---

[56] 汪允宗，〈月霞法師行記〉，《神州日報》1918 年 10 月 27-30 日，第 6 版。
[57] 佚名，〈華嚴大學避兵記〉，第 2 張第 4 版。
[58] 倪嗣沖，〈安徽省長倪嗣沖致內務部諮〉，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 3 輯・文化》（南京：鳳凰出版社，1991 年 6 月〔2015 年 5 月重印〕），頁 741-742。
[59] 學者一般將華嚴大學的被軍對占據的時間，即 1906 年秋，視為華嚴大學停止的時間。參見韓朝忠，〈近代華嚴宗僧教育研究〉，《宗教學研究》2015 年第 4 期，頁 139。
[60]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頁 4。
[61] 汪允宗，〈月霞法師行記（續）〉，《神州日報》1918 年 10 月 30 日，第 6 版。
[62] 應慈老法師編，《正法眼藏》（上海：上海市佛教協會教務組，2015 年），「敘」，頁 3。

闡揚引發了一大批晚清文人對佛學的興趣，同樣也「反哺」於僧侶，月霞便是因此能夠最初接觸華嚴義學。

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這樣評述晚清思想界：「故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63]月霞所交往的士人正是梁任公筆下的「新學家」，無論是先後邀請月霞出洋考察的桂柏華、沈曾植，還是邀請月霞北上講經的孫毓筠，他們或為楊文會的門人（桂柏華、孫毓筠），或為楊氏同契道友（沈曾植），而在華嚴大學被強據時挺身相護的狄楚青，同樣也是楊氏門人。月霞與晚清思想界所交往的，正是所謂「晚清好佛學的人，幾乎都是思想趨新之士大夫」。[64]1916 年 7 月 26 日，康有為在徐子靜的陪同下蒞華嚴大學，與月霞暢談玄理，並在月霞邀請下對華嚴大學師生發表演說。[65]月霞同樣曾受到知識界的邀請，向士人講說經典或者演說，他第一次受邀出洋便是面對旅日的知識界人士講《楞伽經》，後又曾受湖北教育界的邀請，在湖北省教育會設壇講演。[66]月霞對袁世凱的復辟行徑所做出的反應，正是他與晚清民初新派士人的互動下的思想反應，這在太虛在民國喊出「佛教革命」之前，無疑是一種「先聲」。

華嚴大學停辦之後，月霞受邀住持常熟興福寺，本欲假興福寺續辦僧教育，但是因胃病復發，不久之後便圓寂於杭州玉泉寺。和月霞一起離去的，還有晚清民初的那股佛學「伏流」，隨著新潮日盛，佛學再次從時代思想的中心走向了邊緣。

參考文獻：

（一）專書

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
金陵刻經處編，《金陵刻經處大事記長編：1864—1952》，武漢：崇文書局，2022 年。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史・第十五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
歐陽漸著，《歐陽竟無著述集》，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 年。
釋東初，《近代中國佛教史》，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 年。

---

[63]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99。
[64] 葛兆光，〈論晚清佛學之復興〉，《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85。
[65] 佚名，〈康南海蒞華嚴大學校紀略〉，《時報》1916 年 7 月 27 日，第 2 张第 4 版。
[66] 佚名，〈月霞禪師之說法〉，《盛京時報》1917 年 5 月 20 日，第 5 版。

李曉暾，《諦閑月霞兩法師事略》，北京：北京正蒙印書局代印，索書號：普線長722740。
太虛，《太虛大師自傳》，《太虛大師全書・第三十一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195-196。

（二）論文、報刊

左松濤，〈近代中國佛教興學之緣起〉，《法音》總第 282 期（2008 年第 2 期），頁 34-38。
佚名，〈月霞禪師之說法〉，《盛京時報》1917 年 5 月 20 日，第 5 版。
佚名，〈月霞禪師武昌講經記〉，《申報》1917 年 5 月 8 日，第 7 版。
佚名，〈月霞禪師講經記〉，《時事新報》1917 年 5 月 9 日，第 3 張第 4 版。
佚名，〈志諦閑顯珠兩名僧之踪跡〉，《時事新報》1915 年 7 月 29 日，第 2 張第 3 版。
佚名，〈兩法師之歡迎會〉，《申報》，1915 年 8 月 5 日，第 6 版。
佚名，〈孫少侯討論提倡佛教方法〉，《申報》1915 年 7 月 26 日，第 6 版。
佚名，〈浙江督軍署諮覆內務部查華嚴學校借駐軍隊係一時權宜之計已嚴令該管官長對於該寺房屋加意保護文〉，《時事新報》1916 年 11 月 20 日，第 1 版。
佚名，〈特約路透電〉，《申報》1915 年 4 月 12 日，第 2 版。
佚名，〈專電〉，《時報》，1915 年 9 月 4 日，第 2 版。
佚名，〈康南海蒞華嚴大學校紀略〉，《時報》1916 年 7 月 27 日，第 2 張第 4 版。
佚名，〈游歷僧人稟請加給護照〉，《申報》1907 年 7 月 1 日，第 18 版。
佚名，〈華嚴大學避兵記〉，《時報》1916 年 11 月 18 日，第 2 張第 4 版。
佚名，〈僧學堂延聘教員（武昌）〉，《申報》1908 年 11 月 12 日，第 2 張第 3 版。
佚名，〈諦閑月霞兩大師第一日說經之盛況〉，《時報》，1915 年 8 月 13 日，第 3 張第 5 版。
佚名，〈諦閑顯珠兩法師訪問錄〉，《時報》1915 年 7 月 29 日，第 2 張第 4 版。
佚名，〈諮浙江省長浙江華嚴大學校長電呈該校被浙軍強駐轉諮核辦文（第二千六百二十六號，五年十月三十日）〉，《教育公報》第 3 卷第 12 期，1916 年，頁 70。
李曉暾，〈月霞法師事畧〉，《神州日報》1915 年 8 月 31 日，第 8 版。
汪允宗，〈月霞法師行記〉，《神州日報》1918 年 10 月 27-30 日，第 6 版。
持松，〈月霞老法師傳略〉，《覺有情》第 62、63 期合刊（1942 年 5 月），原刊頁碼不清。
范熙壬，〈柬月霞法師〉，《新譯界》第五號（1907 年 4 月 14 日），頁 12-13。

倪嗣沖，〈安徽省長倪嗣沖致內務部諮〉，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 3 輯・文化》，南京：鳳凰出版社，1991 年 6 月〔2015 年 5 月重印〕，頁 741-742。

孫洪伊，〈內務部諮浙江督軍、省長據浙江華嚴大學校長電陳浙江第八團強駐校舍等情諮請查核辦理並希見覆文〉，《政府公報》第 310 期，1916 年 11 月 14 日，頁 10-11。

蛆，〈宗教平等乎〉，《時報》1916 年 11 月 18 日，第 2 張第 4 版。

陳英善，〈月霞大師之華嚴・禪——兼論應慈、持松法師等〉，《華嚴學研究・第三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 年。

陳繼東，〈探尋釋迦原典——近代佛學的形成與中日互動近代佛學的形成與中日互動〉，《漢語佛學評論》（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431-445。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第 11 卷第 3 期（1930 年 3 月），法苑藝林，頁 3-5。

賀金林，〈清末僧教育會與寺院興學的興起〉，《安徽史學》2005 年第 6 期，頁 28-34。

葛兆光，〈論晚清佛學之復興〉，《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85。

蔣維喬，〈天台教觀第四十三祖諦公碑〉，見方祖猷著，《諦閑法師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年，目錄前一頁。

鄧子美，〈近現代華嚴傳燈錄：月霞學案（初稿）〉，《華嚴學研究・第三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 年，頁 46。

諦閑，〈覆諸暨楊紫林居士書〔一〕〉，《諦閑大師文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 年，頁 188。

應慈，〈月霞顯珠禪師行略〉，《武進天寧寺志》卷七，收入《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第 35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 年，頁 255-257。

應慈老法師編，《正法眼藏》，上海：上海市佛教協會教務組，2015 年。

韓朝忠，〈近代華嚴宗僧教育研究〉，《宗教學研究》2015 年第 4 期，頁 137-143。

覺斯，〈時評一〉，《益世報》1915 年 10 月 12 日，第 2 版。

警世人，〈月霞禪師圓寂後之所聞〉，《時報》1918 年 2 月 3 日，第 3 張第 7 版。